

十丈龙孙绕凤池*

——谈世界史学科建设

彭 树 智

世界史观与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关系极为重要。没有科学的世界史观,很难进行根本上的世界史学科建设。这里所说的世界史观,是系统的、涉及全局的世界史观点,如吴于廑先生提出的由分散到整体、纵横交织以及游牧、农耕、工业世界的发展的观点,就是这样的世界史观。

在老一辈史学家中间,吴于廑先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注重于理论问题的思考。他还有一个长处,就是有深厚的经济学功底。1984年我去云南大学时,在滇池风景区踏石阶而上,一个学生告诉我说,吴先生1982年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报告中就引用了山上的一幅名联:“置身须向极高处,举首还多在上人”。我在这幅因风雨长期侵蚀而模糊不清的对联之前,站立良久,倾听学生转达吴先生的赋以新意的解释:“置身须向极高处”,就是说科学研究首先要站在理论的高度,用科学的理论作指导,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举首还多在上人”,就是要谦虚,在科学大道上要尊重前人,也要倾听今人的不同意见。我当时没有机会见到吴先生,但他重视理论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和吴先生的面晤是1988年在延边大学讨论国家教委重点项目《世界史》多卷本的编委会上。吴先生在会上对他的世界史观作了概括阐述,并对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史》、周一良和他共同主编的《世界通史》的优缺点也作了具体分析。他从《世界通史》出版后,一直在思考世界史学科建设问题,已经写出了,而且还计划写出一系列论文,来完善他的世界史观。对他这种孜孜不倦的理论探索精神,以及他的治学与为人,我由衷感到尊敬和钦佩。

吴先生的世界史观由他一系列论文作了最明确的说明。尤其是《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的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以及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写的概观性长条目《世界历史》等论文,集中阐述了他的世界史观。在世界史观的思考中,离不开世界史学科的建设,离不开对世界史大课题的深入研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结合,而吴先生正是在这方面为世界史的学科建设开拓了一个新境界。

研究世界史,从历史观来讲,最重要的是整体的观点。这是因为世界史学科是一个以人类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反映世界发展全貌的历史学科。真正能反映历史全部面貌的应该是世界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包括人类社会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两个方面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

* 此文系作者于今年4月6日至8日为庆祝吴于廑先生八十华诞在武汉大学举行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与世界史观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吴先生突然逝世后,又经作者整理修改。

次,并反映历史基本的社会生产活动、生活活动和组织活动。世界史是一个整体发展的形态,从理论上至少包括三个基本观点:第一,从世界历史全局、而不是片面地以某地区为中心来观察世界历史的全局观点;第二,以纵向的社会历史连续性和横向的地区、国家、民族之间交往连续性相结合来观察世界历史的联系观点;第三,把政治与社会、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宗教、科学技术诸因素融汇于一炉,处理为多样性与统一性关系的综合观点。这三个基本观点组成了世界历史的整体论。用一个中国哲学史上的命题来比喻,就是“和而不同”。“和”即矛盾的一致性,“不同”即矛盾的特殊性。用世界全局的观点、基本联系的观点、辩证综合的观点来观察世界,把世界历史看成由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又是多样性统一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史。

吴先生倡导的“眼在远处,手在近处”的治学方法,既重视史观,又注重具体研究。他在武汉大学组建的“15、16 世纪世界史研究室”,就是把他的世界史观与具体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的一个组织措施,也是他关于世界史学科建设中队伍建设的一个基地。我第一次到武汉大学,对宽阔的校园,古雅的建筑,美丽的校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武大的校风,是对人的培养,是吴先生学风对历史系的影响。当然,吴先生的学术影响决不限于武大,人们习惯称为“周吴本”的《世界通史》,教育了一代史学工作者。吴先生的世界史观也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世界史的发展阶段在吴先生及其他老一辈史学家奠基的基地上就要开始了。

在这里,我想起了清人郑板桥的咏竹诗:“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我在最近出版的《二十世纪中东史》后记中引用了这首诗。我喜欢这首诗,是因为它说明了新老两代的关系,说明了新生者拥有未来的道理。这里的“龙孙”是指竹。“十丈龙孙绕凤池”形容新生竹枝的茂盛。郑板桥还有一首诗:“只道霜筠秃且枯,萧萧落叶思扶疎,风雷时想潇湘急,抽出龙孙一万株。”他总是爱用龙孙比喻新生者,在咏吟之中对新一代充满着希望。现在正是晚春季节,正如辛弃疾《满江红》中所说“春正好,见龙孙穿破,紫苔苍壁”的大好时光。我愿借此机会,再谈谈世界史学科队伍的建设,以寄厚望于青年世界史工作者。

回顾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中的基本建设。现在世界史队伍的主力来自两方面,一是遍及全国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一是国家和各省市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队伍虽无精确统计,但可说是一支相当大的队伍。此外,还有一批研究生的后备队伍。目前有一些社会因素,使队伍有些流失和不稳,然而大多数人仍甘于清苦,口耕笔耘于世界史领域。我举一个例子,尽管出书难困扰着学术界,但还是出了不少书籍。每次学界同仁相见,叹息出书之难的同时,总有一些新著解包相赠,使我们圈内的人,也颇生欣慰之情。

队伍建设主要是队伍本身素质的培养和提高问题。在这方面我认为要加强五个方面的功底的训练。我把它称之为“治史五功”。

第一,理论功底。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对于一个民族是如此,对于治史者更是如此。因为历史学本身作为一门科学,如果轻视理论思维,就会陷入不正确的思维的泥潭,而不正确的思维如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会误入迷津而不返。这样,历史学将不成为科学。机械唯物主义或教条主义,唯心主义或神秘主义,都不能造出正确的世界史观;而只有世界史观的科学创新,才能真正摆脱“欧洲中心论”及苏联史学中的一些弊端,从而建设起新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吴先生的“整体史学”正是这种正确的思维。

第二,知识功底。这是治史的基础。不少老一辈史学家,都是学贯中西、兼通古今的学者。周谷城先生不但著有《世界通史》,还著有《中国通史》。周一良、吴于廑、齐思和、雷海宗等先生,都有湛深的国学功底和中国史的学术成就。作为一个中国的世界史学工作者,必须熟悉中国的文化。这是因为世界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不是一门中国的域外史,而是包括中国在

内的全世界的历史。对中国历史文化知之甚少,是知识结构上一个严重的缺憾,它势必影响世界史学科建设。同时,世界史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要求更广博的知识基础,诸如政治学、经济学、宗教、民族、社会学、军事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知识,否则难以完成综合性任务。

第三,外语功底。这是不言而喻的基本工具基础。研究世界史,没有外语的深厚功底,是无法步入科学殿堂之门的。当然,外语对世界史研究者,只是科学研究的工具,而不是对某门外语的专门研究。在这方面,先应当掌握一门外语,达到熟练程度,然后再修第二、第三外语。一些青年同志有求多不求精的倾向,在未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达到深入研究专业的情况下,贪多求快,这是不可取的。最理想的情况,是以熟练运用一门外语为主,以其他一、两门外语为辅的外语结构。当然,个别有语言天赋的人,尽可以发挥其特长,能出现如季羨林先生这样的语言大家,应该是中国史坛之幸。作为世界史研究者,应当注重用外语写作,以便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及时准确地传播到世界学术界,让世界了解我们史学的新进展。

第四,古汉语功底。提到这个功底,也许有人感到奇怪。学世界史的人,还要有古汉语的功底吗?其实只要把世界史的探索目标看作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历史,这个问题就可理解了。世界史学者要研究中国史,中国的世界史学者更应加倍研究中国史。自然,中国的中国史研究者的许多成果,可供世界史学者吸取综合,但这决不能代替世界史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作为中国的世界史学者,是从世界史的角度,是从世界史学科所担负的任务来研究中国史的。我们是从世界的全局来综合考察中国在人类由原始、闭塞、分散发展为文明、开放和彼此密切联系而形成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古汉语的功底,又怎样阅读、理解繁浩众多的中国古籍资料呢?即使是世界近现代史学者,也不能没有古汉语的功底,否则就很难读懂康有为、谭嗣同的著作,更不用说章太炎的著作了。

第五,写作功底。这个功底,放在最后,并不是说它重要性在以上四个功底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写作功底对世界史工作者是第一重要的。我们的成果见之于社会在于发表,在于出版,而这一切有赖于写作。所以,古今中外的人文社会科学,无一忽视写作。美国语言学会在一百周年纪念日时,提出了“学习通过写作”的命题,并且说对于自然科学也是适用的。我国学者在培养研究生时,大都强调各种形式的练笔训练,尤其重视对学位论文的修改推敲。练笔无疑是科研工作的基本训练。它不仅仅是一般的动手与动脑训练,而且是思维逻辑表达的训练,又是酝酿论点、消化史料和形成成果的训练。

对于青年史学工作者,还应两点特别重要的科研意识:一是要确定自己科研工作的生长点,即有一系列开拓性课题的研究项目,然后有计划地不懈攻关,在这个生长点上生根、开花、结果;二是要选好教学与科研的结合点,作为教师,大量时间用于教课,如果教学和科研分离,必然两败俱伤。前者是指专职科研人员,后者是指教师。对教师来说,结合点就是生长点。教学与科研既有矛盾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时间再用力挤,也不会增加很多,教学的课程是一套,而科研又是一套,必然是矛盾的。但是,如果在所教课程内选好科研课题,如课程中的重点、难点、空白点问题,一年研究两三个,持之以恒,既出了科研成果,又会提高教学质量。所以,教学与科研,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相结合,相得益彰;两相脱离,两败俱伤。如果我们有一大批在教学战线上这样的队伍,同科研专职人员一起攻关,我们世界史队伍的水平就相当可观了。“十丈龙孙绕凤池”的兴旺景象,就会随之出现。